



# 武夷悬棺

张恒 著

文物出版社

走近世界文化遗产  
探索悬棺之谜



张恒 著

# 武 夷 悬 棺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陆 联  
责任编辑 王 铮 崔 华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武夷悬棺 / 张恒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010-2406-3

I. 武… II. 张… III. 武夷山-船棺葬-研究 IV.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5771 号

---

## 武夷悬棺

张 恒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秋雨设计制版有限公司制作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1/32 印张: 4.75

200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406-3 定价: 25.00元



## 序

张恒同志新近杀青的《武夷悬棺》，由戚惠民同志阅后转来，请我提提意见，嘱我写上几句。

说实在的，我对悬棺问题没有什么研究，倒是看了他的书稿之后，才有了一些了解。但我还是欣然地接受了。接受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从他的书稿中看到了年轻一代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学术问题穷追不舍的精神，很是感佩。

比如，对于制作武夷悬棺所用的木材——“闽楠”，是否一定要用铁制的工具才能加工，书稿中分析得十分透彻。先从材料学的角度对“闽楠”的硬度加以界定，然后再通过考古发现的实例进行分析对比。从而得出结论，制作武夷悬棺使用石器工具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分析得很好，有事实，有依据。

又如，通过遗存之间的“扬弃”，来找出武夷悬棺与贵溪悬棺之间的年代先后，分析得也非常好。

没有发现陶器，不等于不能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只要全面地认真地对遗存进行综合考察，这种发展轨迹，总是可以被找到的，并不拘泥于陶器这一种器物上。如果，认为只有通过陶器才能进行类型学的分析，离开了陶器就一筹莫展。这无疑对类型学的原理和作用都是一种曲解，这样的分析是缺乏对遗存进行深入考察的，也难以做到全面客观。

书稿中利用同类遗存的“新陈代谢”，来找出相互之间的年代先后。切入点很好，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当然，书中这样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恺先生（左）与作者近影

的地方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这都说明，张恒同志在写作此书前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不仅基本功扎实，视野开阔，还综合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问题。写出这样的力作，必定对武夷悬棺的研究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可喜可贺，我深为年轻人有这样的精神和能力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另一个方面，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

我有幸一生从事考古工作。在临退下来的几年，曾一度担任过国内著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的领导工作。在那段时间里，让我有机会接触了许多海内外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少年。从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当中，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对“解说词”中所提供的信息，往往不能满足，渴望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我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搞田野调查，搞发掘研究，写报告论文，好像这就是工作的全部内容。今天看来，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做完。如何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如何使考古发掘的成果变成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认识历史、了解祖国传



统文化的途径，同样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古工作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为此，我曾广泛的阅读了不少普及性读物，也曾尝试着邀请作家和学者一同整理材料、编写读物。坦率地说，写出来的文章往往不能令人满意。要么过于文学化，缺乏对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或者过于专业化，文章艰涩难懂，达不到普及的目的。

读了张恒同志的《武夷悬棺》，使我有相见恨晚之感。他在“深入浅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文章内容很深刻，包含了对学术问题的全面剖析。但语言文字却十分浅显易懂兼有趣味性，引人入胜，便于广大读者阅读。

我认为，张恒同志的《武夷悬棺》，不仅专业工作者可以读，读了可以讨论学术问题；非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可以学到很多历史文化知识、考古学知识，并能对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真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文章。

我不擅溢美之词，以上的这些话都是我的读后所感，在张恒同志的新作出版之前，权且作为序吧。

但愿有更多的读者从中读取有益的东西。

王 恺

2007年5月于铁刹寓所



# 目 录

序 .....	i
引 子 .....	1
悬棺与悬棺葬 .....	3
武夷悬棺种种 .....	9
千古遗棺 .....	11
“武夷山一号船棺” .....	17
“武夷山二号船棺” .....	19
考古学的“两把尺子”和“一把快刀” .....	28
年代背后的玄机 .....	33
群贤的质疑 .....	35
年代之“谜” .....	38
是是非非“碳十四测年” .....	39
几何印纹陶片问题 .....	46
几何印纹陶 .....	46
江西贵溪悬棺 .....	46
棉纺织品问题 .....	51
史料记载问题 .....	54
加工工具问题 .....	57
武夷悬棺年代的确定 .....	66

距今 3000 多年 .....	72
年代最久远的悬棺 .....	73
悬棺葬俗的发祥地 .....	78
悬棺的主人是谁 .....	81
无余说 .....	81
彭祖说 .....	87
百越族说 .....	94
闽族说 .....	98
独立的少数民族说 .....	99
联系与猜想 .....	102
悬棺高置的缘故 .....	110
“弥高至孝”的典故 .....	111
“子孙高显”的来历 .....	115
“葬”与“悬棺葬” .....	119
被放在高处的船 .....	125
武夷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 .....	129
结 语 .....	133
注 释 .....	135





## 引子

武夷山脉绵延千里，呈东北—西南之势。北接浙南的仙霞岭，南临粤东的九连山，像一条卧龙，逶迤在闽、浙、赣、粤四省之间，立体地勾勒出闽越古地天然的地理边界。在它的北段、东南一侧，有一座以山命名的城市，这就是武夷山市。

武夷山市的南郊，发育着一片方圆70平方公里的“丹霞地貌”。其中，有三十六座奇峰和九十九块巨岩错落林立，一条溪流盘曲其间。在奇峰和巨岩的石罅里，布列着许多天然的岩洞。人称千古之谜的“武夷悬棺”，就在这些洞中。

从20世纪的70年代开始，便不断有中外学者翻山越岭来到武夷山进行考察研究。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进入武夷山的道路已不再崎岖。每年，从空中，从地面，纷至沓来的海内外游人已逾百万之众。

许多游人迢远千里的乘兴而来，一番瞻仰之后，又满腹狐疑而去。

“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

“他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上面？”

“悬棺放在上面有多少年了？”

一个个令人思索又不得其解的疑团，萦绕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久久不能散去。武夷悬棺却依然独守着它的那份沉默，始终以“谜”的形象面对着世人。

所谓“谜”，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就是“还没有弄明白或难以理解的事物”。

那么，武夷悬棺究竟有哪些问题是“还没有弄明白”，或者“难以理解的”呢？

纵观多年来的研究，所谓“武夷悬棺之谜”，并没有特定的内涵。或者说，并不存在着一个具体的“谜”。

它是一个由专家们不断研究，但又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的一系列问题的组合体。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 年代问题——即武夷悬棺是什么时候的遗存。
2. 族属问题——即武夷悬棺的主人是谁。



3. 宗教观念问题——即悬棺人为什么要把悬棺放置在悬崖峭壁之上。

4. 放置问题——即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

5. 武夷悬棺与全国其它地方悬棺的关系，等等。

但是，通过阅读学术论文，来对上述问题作一个全面的了解，着实不是一条好的途径。

学者们发表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它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同行业的专业人士。所以作者无需考虑读者的专业知识水平，也不讲求文学色彩，只注重文章的逻辑结论。对于文中所使用的大量专业术语，作者往往只做简单的交代。有些文章，因受篇幅的限制，甚至干脆不做交代，或者只在注释中略加说明。

“从语言表达来看，学术论文是运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图表、符号表达内容的，它主要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看得懂，而是要把学术问题表达得简洁、准确、规范。因此，专业术语用得很多。”（王世华《史学论文写作》）

这就给广泛性的阅读带来了困难，也让许多有兴趣的读者为之却步。

笔者不是研究悬棺问题的专业人员，基于对武夷悬棺的浓厚兴趣和工作上的便利条件，多年来，一直关心着这一研究的进展。笔者不揣浅陋，希望把学术界研究武夷悬棺的主要观点，以及在考察中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一些肤浅的思考，用最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大家。以期对那些有心了解，但又无暇顾及的朋友提供一点帮助，并能唤起更多的朋友，对武夷悬棺产生兴趣。

武夷山优越的自然遗产，是天地间神奇造化的结果，它是我们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不可多得的殿堂。而武夷山丰厚的文化遗产，则是先人智慧的高度结晶，是一笔潜力无穷的文化财富。

武夷悬棺，就是这份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由于年代的久远，它已显得面目不清，甚至支离破碎。但是，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恰恰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更需要我们用心地去发掘，努力地去还原其本来面目。

只有了解它、认识它、关注它，才能尊重它、爱惜它、并更好地保护它。



## 悬棺与悬棺葬

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在我国的福建、江西、湖北、重庆、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广东、云南、山西和台湾地区都陆续发现了悬棺的踪迹。

由于悬棺现象特有的神秘性和发现地的不断增多，人们对它的关注热情也越来越高。不仅中国的学者持续不断地对它进行研究，外国的学者也在陆续加入进来。研究群体也从单一学科发展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多领域共同研究的局面。

那么，悬棺最早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呢？又是怎样被命名的？全国各省市发现的悬棺，从形制到葬法各具特点，为什么人们都把它们叫做“悬棺”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遥远的古代说起。

一千四百多年前，武夷山迎来了一位十多岁的少年。他满口吴侬软语，目光睿智，气宇非凡。

从踏进武夷山的那天起，他就一路探访，一路还不停的记着些什么。完全不似普通游人，倒像一位学者，正在进行着实地考察。

突然，一种奇特的景观，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在许多悬崖峭壁上的岩洞里，直插着一些像船一样的东西。

这样的景观，不仅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书里，也从来没有读到过。这让他十分兴奋着迷，又让他陷入沉思。

旅行结束后，他把这发现写进了一本名叫《建安地记》的书里。这位少年，就是顾野王。

顾野王（519—581年），字希冯，南朝吴郡吴（今江苏吴县）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学家、文字训诂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诗人和书画家。

他幼即好学。七岁读《五经》，即能略知大旨。九岁习文，即作《日赋》。十二岁时，他跟随赴任的父亲，到了建安郡（今福建省建瓯市，位于武夷山南，是当时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此期间，他首次游历了武夷山，并撰写了《建安地记》两篇。他还先后担任过太学博士、金威将军、迁国子监博士、领大著作、掌国史、黄门侍郎、光禄卿等一系列文武要职。



但是，后人更愿意把他看作一位学者。

顾野王的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学、地方志、史学等诸多方面。著有《玉篇》三十卷，《舆地志》三十卷，《符瑞图》十卷，《顾氏谱传》十卷，《分野枢要》一卷，《续洞冥记》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国史纪传》二百卷。最后两种皆因过世而未及完成<sup>[1]</sup>。其中，《玉篇》作为我国的首部楷书字典，至今还在流传使用。

陈天嘉年间（560—565年），顾野王奉命赴任福建，又回到了少时生活的故地——建安郡。

重游武夷山水，使他再次深受感动，并发出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美哉河山，真人世所希靓也”的感叹。

不久，他萌发了隐居的念头。在武夷山一住就是近20年。

顾野王隐居武夷山后，慕名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他也诲人不倦，著书之余，便以平生所学教授当地的乡人。清《崇安县志》和民国《崇安县新志》都有这样记载：“崇人知学自野王始。”

“崇”就是崇安县。武夷山市于1989年撤县改市。之前，从公元994年（即北宋淳化五年）到公元1989年都叫崇安县。

《建安地记》是顾野王的地理专著，以描述和介绍闽北地区的山水地貌、风土民情为旨要。

文中，他首次披露了武夷山有神秘的悬棺：“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于烟岚之中。……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崖有悬棺数千。”<sup>[2]</sup>

“悬棺”一词由此产生，顾野王也成为用文字记载悬棺的第一人。

尽管在撰写《建安地记》时，他还只是位十多岁的少年。但日后文名鼎鼎的学者声望，以及长期隐居武夷山给后世造成的影响，使武夷悬棺也伴随着他的文章而名扬天下。

此后，相关的记载便不断出现在各种文献当中。

我国历史上，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对所见所闻的武夷悬棺，做了丰富而详实的载录。南朝肖子开的《建安记》、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南宋朱熹的《武夷山图序》、明朝徐霞客的《游武夷山日记》、清朝《崇安县志》、清朝董天工



的《武夷山志》等等。

可以说，在全国已发现的悬棺当中，武夷悬棺是最早被发现的，史录也最丰富。

196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来到武夷山。为了一睹武夷悬棺，他不惜冒雨乘舟探访，且赋诗记之：“为觅虹桥迹，雨中试小游。航艰人负楫，滩浅石攻舟。峭壁沿溪列，烟云拂岭浮。船棺真个在，遗蜕见崖隈。”<sup>[3]</sup>

“虹桥”指的是“虹桥板”，是在悬崖峭壁间用来支架悬棺或架设通道的木板。

1984年，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游览武夷山，并赋《武夷曲》一首：“谁说造化心无计？武夷山水如此奇。独石兀立成千峰，涓涓细流汇曲溪。溪浅筏轻浮石过，峰高拔地与天齐。人生难比九曲险，眼望东来筏向西。仰叹危岩飘仙舟，千年古骨壁上栖。传说从来多情意，仙境幻象亦可哂。可羨玉女并肩立，鬢花丛丛从不稀。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sup>[4]</sup>

“仙舟”指的就是武夷悬棺。

可见，“悬棺”一词，虽由顾野王在武夷山所创，但它却没有始终成为武夷悬棺的专有名词。

一千多年来，由于古人对悬棺的认识不同，在记载悬棺时，曾陆续使用过：“架壑船”、“船”、“仙船”、“仙艇”、“艇”、“仙蛭”、“仙函”、“仙人葬骨”等多种不同的称谓。南宋理学家朱熹曾长期隐居武夷山，他称武夷悬棺为“架壑船”。民间更有“金棺材”、“鲁班尺”、“金猪栏”、“金扁担”等俗称。

“悬棺”一词，曾经长期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卷册当中。它被作为专有名词，重又蜚声遐迩，频繁出现在世人面前，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才开始的。

现代学者对悬棺进行学术研究，肇端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

1932年，美籍学者葛维汉发表了《四川古代的白人坟》一文，对四川南部文兴、珙县一带的悬棺，首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古代中国白人（夔人）的坟墓。”<sup>[5]</sup>

葛维汉是上世纪初活跃于我国四川一带的著名文化人类学家。他对四川的汉族及少数民族的宗教和习俗进行过大量的调查，并有丰富论著，如：《羌族的习俗与宗教》、《四川苗族的著教习



俗》、《四川苗族的故事与歌谣》、《有关夔人（白人）的历史文献》、《川南的夔人（白人）墓葬》、《汉州（广汉）发掘简报》、《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的石器》、《四川省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中国石器琐记》等。

《四川古代的白人坟》一文，不仅首开了对悬棺问题的研究，也是对“夔人”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但是，葛维汉的观点并没有被当时的学术界普遍接受。数年后，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提出：这些悬棺“是苗族的葬制”<sup>[6]</sup>。更有学者认为，它最早起源于埃及和波斯，后传入中国的西南<sup>[7]</sup>。

1946年夏，芮逸夫、石钟键受中央研究院的委派，就悬棺问题前往川南地区进行考察。

中央研究院，也叫“国立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隶属中央政府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成立于1928年。成立之初，由蔡元培先生任院长。下设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心理研究所。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民族学研究的积极鼓吹者和大力推动者，人称中国的“民族学之父”。早在1926年，他就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极力倡导在中国开展民族学研究。中央研究院成立后，他在担任院长的同时，还亲自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主任。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学研究进入了第一个繁盛时期，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

芮逸夫、石钟键，就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员和助理员。

他们到达川南地区之后，进行了近两个月的民族学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实地察看了四具悬棺。1948年，芮逸夫发表了《僚为仡佬试证》一文。

文中，他把各种与山崖有关的墓葬，按照葬法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崖墓——凿穴筑室，藏棺其中。

崖圻——凿崖为圻，置棺其中。

悬棺——钉桩崖壁，架棺其上。





并且，把四川南部（文兴、珙县）发现的悬棺现象，称为“悬棺葬”。

他认为：“古代的僚人就是后世的土僚或仡佬，悬棺葬为僚人或仡佬之俗。”<sup>[8]</sup>

至于川南地区的悬棺究竟属于哪个民族的葬俗，后世仍有不少的讨论。但芮逸夫先生的分类和命名，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并对悬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此，“悬棺”、“悬棺葬”被作为专有名词，在学术界广泛流传开来。

川南地区和武夷山相距数千里之遥，但后续研究表明，两地悬棺文化的内涵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

20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我国考古事业在“文化大革命”后逐步得到复苏。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迅速地在全国展开。

于是，越来越多的各式悬棺在全国各地被发现。与此同时，各种与山崖有关的墓葬也不断地被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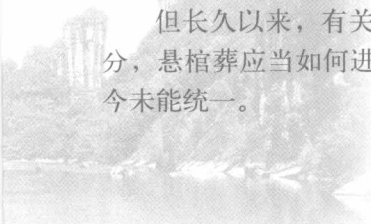
新发现的悬棺，无论从形制到葬法，都突破了芮逸夫先生分类时的情况。不同的称谓，也跟着多了起来。

譬如，川东地区称悬棺葬为“岩棺葬”；武夷山称“架壑船”、“崖洞葬”；江西、广西称“崖墓”、“崖洞葬”；四川珙县则称“悬棺葬”。有些研究文章干脆把所有与山崖有关的墓葬都叫做悬棺葬。一时间，在悬棺研究领域，出现了“各行各叫”的纷乱局面。

有学者提出，悬棺葬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的一种特殊葬俗，应当有它特定的内涵。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葬具放置在临水的悬崖峭壁之上，即“葬在崖上”，突出一个“悬”字。不应把凡是与山崖有关的墓葬，都称为悬棺葬。特别是，要把悬棺葬与崖墓、崖洞葬区分开来。

也有学者认为，悬棺葬分布的地域范围广、延续年代长，在形制、礼俗和文化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类型的划分。

但长久以来，有关崖墓、崖洞葬与悬棺葬之间究竟应当怎样区分，悬棺葬应当如何进行类型的划分，学者们的意见各有分歧，至今未能统一。





有学者对悬棺葬的葬法和葬具的形式做了如下的归纳：

葬法包括：

**崖洞式** 利用临河峭壁上的天然洞穴或裂隙，略加修整(垒筑、填平)，或架设木杠，置棺其内。主要见于福建武夷山、江西贵溪、长江三峡地区、贵州岑巩、四川珙县麻塘坝等。

**崖墩式** 将葬具放置在绝壁上，由天然岩石层理的罅隙所形成的狭长的平台状石墩上。或用人工略加填平、开拓。其特点是，悬崖上的棺木毕露不藏，可望而不可及。主要见于四川巫溪荆竹坝、湖北秭归、鄂西南清江流域、湘西沅水流域、四川珙县麻塘坝、广西左右江等。

**横穴式** 在悬崖上人工开凿横龛，大小宽窄仅容一棺横陈，棺侧外露。这种葬法可能是崖墩式的发展，起初只是对天然崖墩略加开凿，加宽加高，以后则全部用人工凿成规则的长方形龛。主要见于四川巫溪南门湾、贵州松桃仙人岭、湘西沅水流域、川南南广河流域、四川高县罗场等。

**直穴式** 人工开凿直洞，墓室的长轴方向与岩缘垂直。有的口小腹大如袋状，与四川常见的岩墓(蛮洞)相似。主要见于四川南广河流域、贵州赤水河流域和鲮水河流域、湖南西水河流域。

**崖桩式** 在悬崖峭壁上凿孔钉桩。在两至三根对称的木桩上放置棺木，站在崖下可望见棺底。主要见于四川、云南交界的兴文县、高县、珙县、筠连县、镇雄县、昭通市等。

葬具有如下几类：

**船形棺** 棺柩的首、尾两端上翘，形状如独木舟。主要见于福建武夷山。

**圆筒形棺和长方形棺** 外部呈圆筒形和长方体形。普遍见于全国各地发现的悬棺。

**似房形棺** 从棺柩的两端看，很像房屋的造型，盖顶作悬山式，中间起脊，两侧平斜。主要见于江西贵溪。

**扁圆形棺** 外部呈扁圆形。主要见于江西贵溪。

由此可见，“悬棺”一词在今天，早已不再是仅指武夷悬棺。它已经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内涵和更加严格的界定。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悬棺”这种特有文化现象的总称。





## 武夷悬棺种种

从史料的记载和实地调查来看，武夷悬棺一共有四种形式：船形棺、圆筒形棺、瓷缸和函。

船形棺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最多，诸如“舟”、“船”、“艇”、“仙船”、“架壑船”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已经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圆筒形棺不见于记载，但在武夷山的白岩以及周边的岩洞中，可以见到这种形制的悬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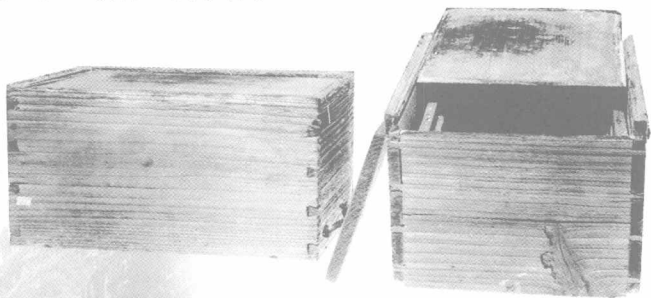
瓷缸只见于记载，如：“（升真洞）……其中有神仙蜕骨，贮以霞纹瓷缸”<sup>[9]</sup>。但至今未发现完整的实物。

函在文献中也有很多记载，如：“张仙岩一函，换骨岩九函，仙钓台、真武洞三函，白云岩右洞数函，大藏峰石罅中十六函”<sup>[10]</sup>。

1979年8月，崇安县的考古人员在武夷山鼓子峰西南壁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四只长方形的木盒，有一只已经损毁，另外三只基本完好，盒子的质地为杉木，外涂油漆。四只木盒的尺寸完全一样：长37、宽27、高20.5厘米。

每只木盒里嵌有一只盛有碎骨的小木盒。碎骨分别用草纸—宣纸—麻布—绢帕，由内而外，层层包裹着。绢帕上有用毛笔书写的文字。

第一只，上书：“建阳县崇文里□□□帕壹方伏愿萱亲增福寿□□康宁”；下落：“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吉日焚香谨题”。宣纸上有“封”、“钦命”的字样。



在武夷山“鼓子峰”发现的盛有遗骸的木盒